

# 崧泽文化陶质酒器初探

张小帆

关键词：崧泽文化 陶质酒器 礼器 礼制

KEYWORDS: Songze Culture Pottery Wine Vessels Ritual Vessels Ritual Systems

ABSTRACT: Wine i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the ritual systems in ancient China, and it also has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the sacrifices and witchcrafts in the Neolithic Age. Pottery wine vessels are important material cultural remains of the civilization process during the Songze Culture period in the Lake Tai basin. By type, the pottery wine vessels of the Songze Culture could be classified into *yan*- and *zeng*-steamers, basin and *yi*-pouner, *zun*-vessel, wine filter, jar and jug, *gui*-pitcher, *he*-pitcher, pot, cup and special-shaped vessel, ten types in total; by functions and uses, they could be classified into brewing vessels, storing vessels and serving vessels; by cultural properties, they could be classified into non-ritual vessels and ritual vessels. Pottery wine vessels as ritual vessels emerged newly in the Songze Culture, and gradually evolved into the ritual wine vessel assemblage of *ding*-tripod, *dou*-stemmed bowl and pot. The ritual vessel system and ritual system born in the Songze Culture profoundly influenced the ritual vessel and ritual systems of the Liangzhu Culture.

## 一、引言

崧泽文化是环太湖地区新石器时代从马家浜文化到良渚文化的发展演进过程中，出现的一支重要的考古学文化。

公元前3500年前后是我国古代社会文明化进程中“大分化、大变革”的重要时期，地处东南地区的崧泽文化在这一时期蓬勃发展，与红山文化、仰韶文化、屈家岭文化、大汶口文化等并驾齐驱。在崧泽文化中产生了造型独特的礼器——陶质酒器，初步形成了太湖流域独特的礼制和礼仪。崧泽文化之后的良渚文化是我国新石器时代文化最发达、文明化程度最高的考古学文化之一；而崧泽文化是良渚文化的文化来源，祭祀土台、高台墓地、大型墓葬、陶质礼器、玉器等诸多

良渚文化的文明因素在崧泽文化中已初见端倪，良渚文化中的诸多文明因素皆滥觞于崧泽文化，都可在崧泽文化中溯流追源。

20世纪末期，基于上海崧泽<sup>[1]</sup>、苏州草鞋山<sup>[2]</sup>和张陵山<sup>[3]</sup>、武进乌墩<sup>[4]</sup>、昆山赵陵山<sup>[5]</sup>、余杭吴家埠<sup>[6]</sup>、嘉兴南河浜<sup>[7]</sup>等遗址的发现，崧泽文化的研究多集中于崧泽文化对中国远古文明的历史贡献以及在太湖地区史前社会复杂化进程中与良渚文化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关系。进入21世纪以来，由于海盐仙坛庙<sup>[8]</sup>、湖州昆山<sup>[9]</sup>、海宁小兜里<sup>[10]</sup>和达泽庙<sup>[11]</sup>、吴江同里<sup>[12]</sup>、无锡邱承墩<sup>[13]</sup>、常州新岗<sup>[14]</sup>、江阴南楼<sup>[15]</sup>、张家港东山村<sup>[16]</sup>等遗址的发现，崧泽文化的研究又多集中于聚落形态的形成、变迁、发展和崧泽文化在中国文明起源中的地位与作用的探讨。但此前对于崧泽文化的礼

作者：张小帆，南京市，210016，南京博物院。

制则显得研究不足。

吴汝祚、牟永抗先生认为，崧泽文化礼制“一是陶质礼器的增加和开始孕育以玉璧为代表的成组的玉礼器，同时还出现了以事神为目的而人工堆筑的祭坛，反映了超越个人祭祀之上的巫术活动的规格和规模；二是礼的功能从单纯的协调人神关系的事以致福的活动，开始转向体现社会地位不同的氏族成员之间的人际关系，为良渚文化时期礼制的前奏”<sup>[17]</sup>。在吴县张陵山、昆山赵陵山、无锡邱承墩、桐乡普安桥<sup>[18]</sup>、海盐仙坛庙、海宁小兜里等崧泽文化向良渚文化的过渡性文化遗存中，陶鼎、豆、壶已成为礼器的固定组合，小玉璧、镯、璜、佩等往往与陶礼器共存。陶礼器与玉礼器的共存现象反映出太湖流域礼制和礼仪发展演进的轨迹，从崧泽文化到良渚文化，太湖流域的礼器经历陶礼器为主到陶、玉礼器并重再到玉礼器为主的演进过程。

目前有关崧泽文化礼器与礼制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玉器<sup>[19]</sup>，而陶礼器尤其是陶质酒器的研究至今尚无人问津。

陶质酒器是崧泽文化时期太湖流域文明化进程中最重要的物质文化遗存，是揭示崧泽文化文明化进程中出现礼制、礼仪的最重要的标志物之一。苏秉琦先生也认为新石器时代的酒器与礼制有着密切的关系，“甲骨文中的‘酉’字有的就是尖底瓶的象形，由它组成的会意字如‘尊’、‘奠’，其中所装的不应是日常饮用的水，甚至不是日常饮用的酒，而应是礼仪、祭祀用酒。尖底瓶应是一种祭器或礼器，正所谓‘无酒不成礼’”<sup>[20]</sup>。但目前关于新石器时代的酒、酒器和礼制的研究还主要集中于农耕文化、农业文明与酒的起源<sup>[21]</sup>。因此，笔者不揣浅陋，就崧泽文化陶质酒器的器形、功能和性质谈谈认识。

## 二、崧泽文化陶质酒器的分类

我国古代酿酒是先将酿酒原料如稻米

淘洗、浸泡后置于炊具中蒸熟，散晾冷却后拌入酒曲使之发酵，发酵到一定程度后取出压榨成浊酒，再过滤成清酒后注入容器中贮藏。宴享时根据不同的需要使用不同的器皿。

如此，酒器包括酿造、贮藏和宴享等不同阶段的用器，而崧泽文化的陶质酒器基本涵盖了从酿造到宴享的全过程。

崧泽文化陶质酒器可按器形、功能和性质进行分类。

### （一）器形

根据器物的形态，可将崧泽文化陶质酒器大致分为十类。

第一类，甗甑类酒器。可能与饣、留有关的陶质酒器主要有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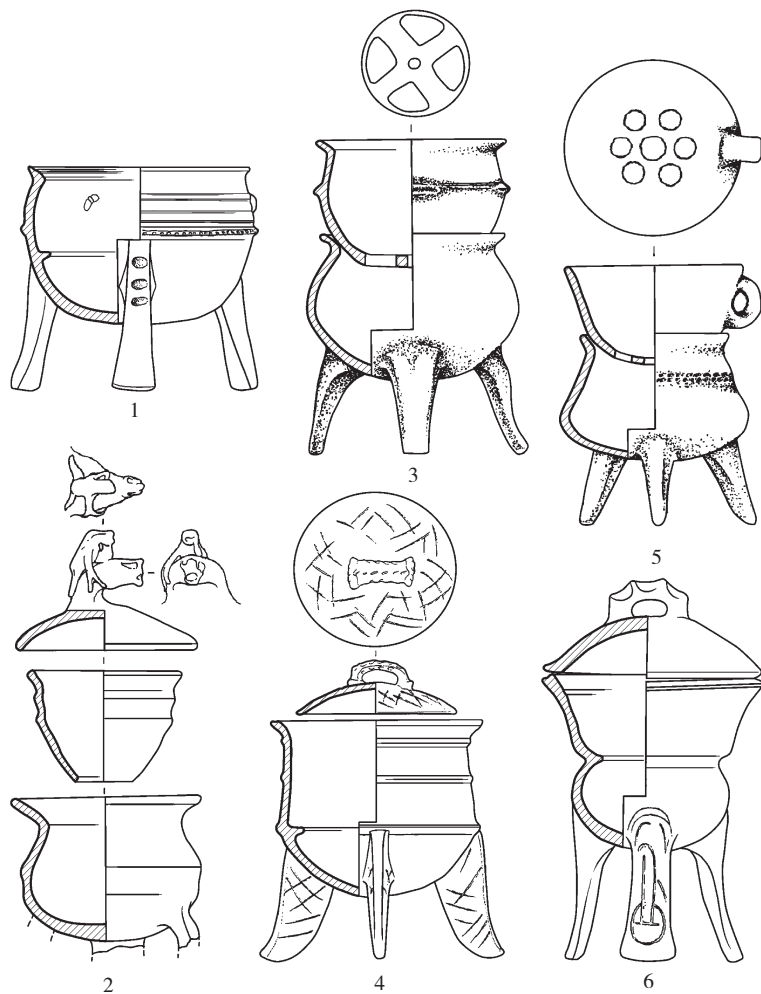
鼎形甗 考古发掘报告中有的称鼎，也有的称甗。常见<sup>[22]</sup>，如嘉兴南河浜H7：3、M44：2（图一，1、4）。其器形虽为鼎，但腹内壁的下方凸出一周算隔，算隔上可置片状竹算，竹算上置淘洗浸泡后的稻米等酿酒原料，下方放水，水加热沸腾后利用蒸气将稻米蒸熟。

鼎、甗合体甗 偶见，如嘉兴南河浜M78：10（图一，6）。下部为鼎，上部为甗，鼎与甗的交接处束腰，束腰处的内壁凸出一周算隔，上可置竹算和竹席。鼎内置水，甗内置淘洗浸泡后的稻米。

鼎、甗分体甗 考古发掘报告中往往将其分属两个器物，分别称作鼎、甗。常见，如嘉兴南河浜M59：15，常州新岗M5：18、19和M47：1、2（图一，2、3、5）。甗置于鼎上，甗的底部有孔，上有盖。

《说文·瓦部》：“甗，甗也”，段注：“甗所以炊蒸米为饭者，其底七穿，故必以算蔽甗底而加米于上，而饣之，而留之”。

蒸，古代称蒸。《说文·火部》：“蒸，火气上升也”，《诗·大雅·生民》：“蒸之浮浮”，孔疏：“炊之于甗，饣而蒸之”。蒸又分为饣和留，半熟为饣，全熟为



图一 甗甑类陶质酒器

1、4.鼎形甗（南河浜H7：3、南河浜M44：2） 2、3、5.鼎、甗分体甗（南河浜M59：15，常州新岗M5：18、19，常州新岗M47：1、2） 6.鼎、甗合体甗（南河浜M78：10）

馏。《诗·大雅·洞酌》：“挹彼注兹，可以饘饠”，郑注：“饘，蒸米一熟，而以水沃之，乃再蒸也”；《尔雅·释言》：“饘，馏稔也”，郭璞注：“饘熟曰馏”。酿酒用的稻米必须蒸熟而不是煮熟，蒸熟的稻米黏性差，易于打散，便于拌入酒曲，因此饘、馏用的甗甑类陶器可能与酿酒有关。

第二类，盆匚类酒器。可能与淘洗酿酒原料、拌曲、搅拌、冷却有关的陶质酒器有盆、匚。

刻槽盆 又称澄滤器。偶见，如嘉兴南河浜M16：34（图二，1）。敛口，平底，内壁有

刻槽。可用于酿酒原料的淘洗、拌曲，或发酵期间酿酒原料的搅拌、冷却。

匚 常见，如嘉兴南河浜M33：7、M62：10（图二，6、5）。敛口，平底，内壁无刻槽。口部有一管流，可用于将酿好的酒注入小口的储酒容器内。

刻槽匚 又称带流刻槽盆。常见，如吴江同里M43：8和嘉兴南河浜F4：13、T201⑦：2（图二，3、4、2）。敛口，平底，器内壁有刻槽，口部有一流。可用于酿酒原料的淘洗或拌曲，或用于稻米发酵后的压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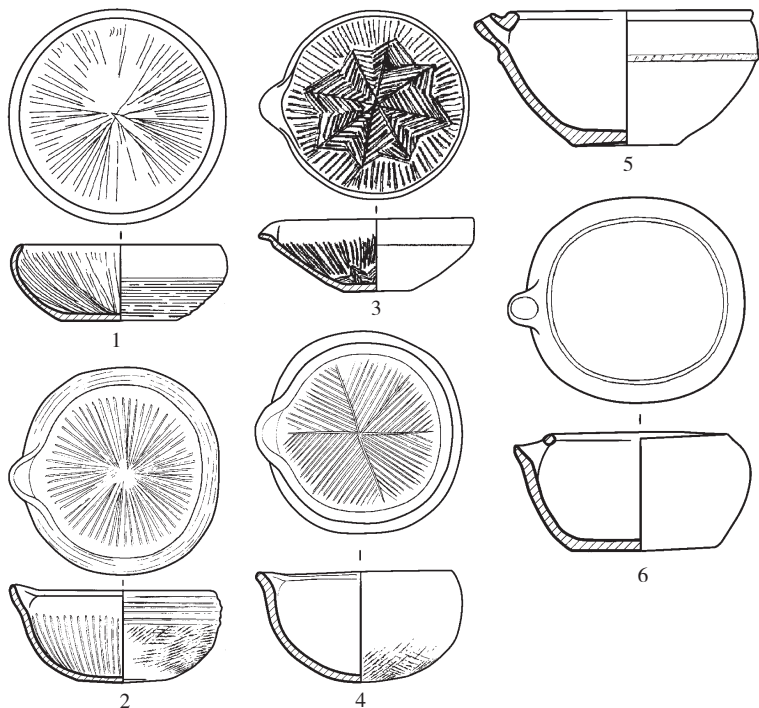
山东日照两城镇龙山文化陶器化学分析结果表明，检测出酒成分的最为常见的陶器有杯、鬲、壶、罍、罐、算、盆<sup>[23]</sup>。龙山文化的年代虽晚于崧泽文化，但陶算、盆检测出酒的成分，表明新石器时代甗甑类陶器和盆匚类陶器皆有可能

用作酒器。

第三类，尊类酒器。可能与发酵有关的陶质酒器有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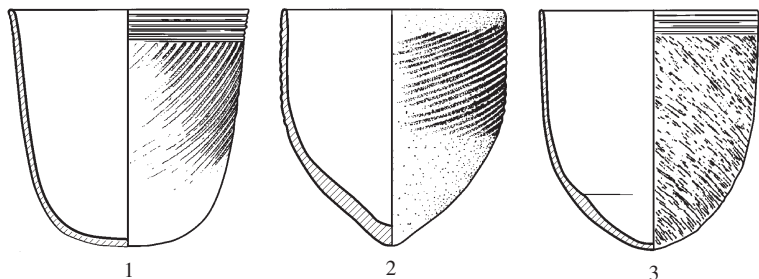
大口尊 又称大口缸。常见，如嘉兴南河浜G2：1、M54：1和海宁小兜里M33：1（图三，1~3）。多夹砂陶，壁较厚。敞口或直口，圜底或尖底。饰粗绳纹。

蒸熟并拌入酒曲的稻米进行发酵的过程即“酿”。《说文·酉部》：“酿，酏也，作酒曰酿”。崧泽文化可能用于酿酒的陶器主要是大口尊，将拌曲后的稻米置入大口尊进行发酵，发酵期间温度会升高，大口尊易于根



图二 盆匣类陶质酒器

1.刻槽盆(南河浜M16:34) 2~4.刻槽匣(南河浜T201⑦:2、同里M43:8、南河浜F4:13) 5、6.匣(南河浜M62:10、南河浜M33:7)



图三 尊类陶质酒器

1~3.大口尊(南河浜G2:1、南河浜M54:1、小兜里M33:1)

据温度对发酵的稻米进行搅拌冷却。

酒是用含淀粉的原料经酿造制成的含乙醇的饮料,酿酒的关键是酒曲。《尚书·说命下》:“若作酒醴,尔惟麹蘖”,常用发霉或发芽的谷物制成曲蘖,酒曲中含有大量的微生物,经过催化作用分泌出的酶可将谷物中的淀粉转变成糖分,糖分在酶的作用下分解成乙醇。大口尊在崧泽文化墓葬中往往置于特殊的位置,如海宁小兜里M33(图四)、M17、M20、M35等。这可能与大口尊

为酿酒器有关。

第四类,滤酒器。可能与滤酒相关的陶质酒器有勺和滤酒器。

勺可能多为木质或竹质,故陶质偶见,如上海崧泽M93:1(图五,7)。前端为浅勺,后有柄,可用于向滤酒器的滤钵内挹酒。

勺或称料或斗,《说文·木部》:“料,勺也”,《诗·小雅·大东》:“维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浆”,《诗·大雅·行苇》:“曾孙维主,酒醴维醑。酌以大斗,以祈黄耆”。

滤钵 发掘报告称为甑,应为滤酒器的组成部分。常见,如余杭官井头<sup>[24]</sup>M62:11(图五,6)。碗形或钵形,底部有小孔。

滤酒器 又称澄滤器。常见,如余杭吴家埠H13:14、M19:8和余杭官井头M83:7、M45:2、M35:9(图五,2、5、3、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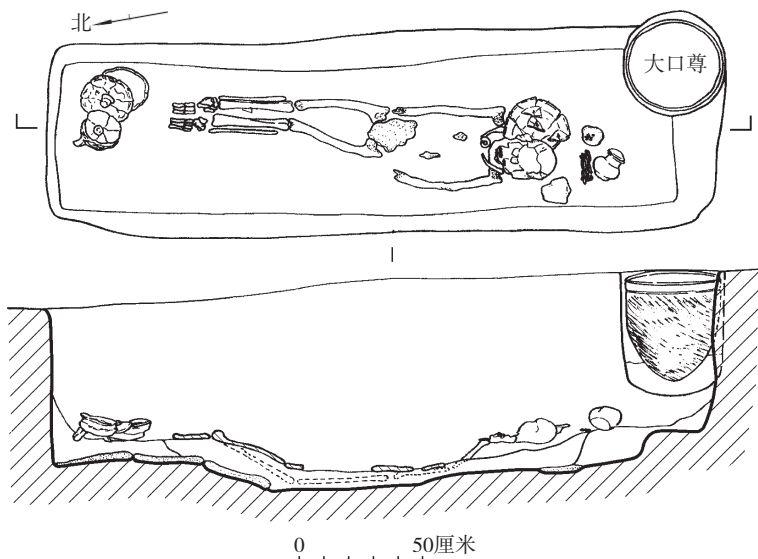
下部多为碗形或钵形,平底,矮圈足或高圈足。口

沿一侧向上伸出一漏斗,漏斗上置滤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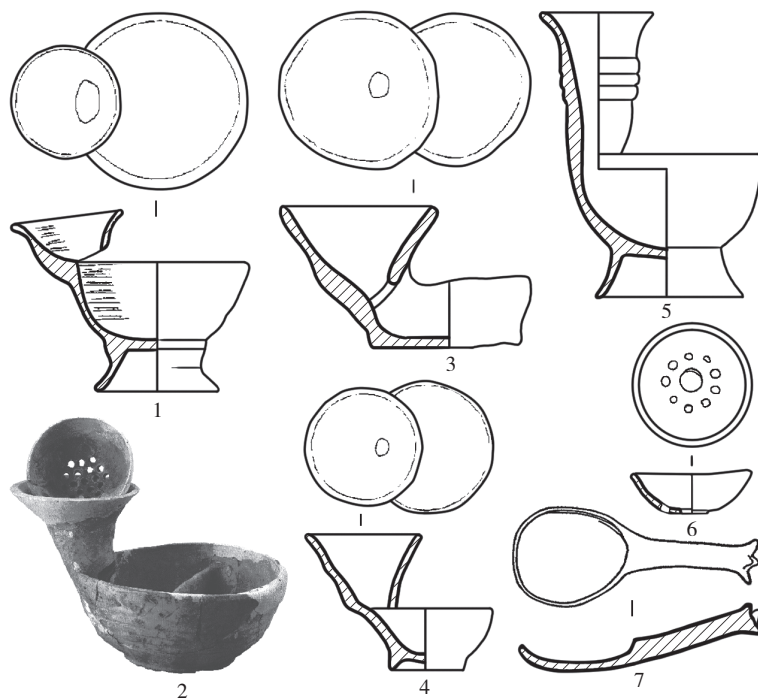
新酿造的酒为醪,即内含较多悬浮物的浊酒。将酿出的醪用勺舀出并注入漏斗上的滤钵,过滤后即清纯的酒。

第五类,罐瓮类酒器。可能与贮存或搬运有关的陶质酒器有罐、瓮。

罐 常见,如嘉兴南河浜M19:6、M63:6、M46:18和上海崧泽M59:2(图六,1、3、5、4)。高领,有盖,腹部圆鼓,平底、矮圈足或圜底,有的还饰有精美的纹饰。



图四 海宁小兜里M33中大口尊出土位置



图五 陶质滤酒器

1~5.滤酒器(官井头M35:9、吴家埠H13:14、官井头M83:7、官井头M45:2、吴家埠M19:8) 6.滤钵(官井头M62:11) 7.勺(崧泽M93:1)

瓮 器形似罐，但体形较大。常见，如嘉兴南河浜M43:5、M24:6(图六，2、6)。鼓肩，深腹，下部斜收。

酿造、过滤后的酒装入罐、瓮等容器并

封口后，经过避光陈贮可获得醇厚绵柔的口感。小口的罐、瓮都可以贮藏酒。《说文·缶部》：“罐，器也”，《说文·瓦部》：“瓮，罌也”。罌又称罌缶，《汉书·韩信传》颜师古注：“罌缶，谓瓶之大腹小口者也”。

第六类，鬯类酒器。可能与温酒有关的陶质酒器主要有鬯。

实足鬯 常见，形制多样，如安吉安乐<sup>[25]</sup>M96:1，张家港东山村M91:14、43和M91:13、44<sup>[26]</sup>，常州新岗M12:8(图七，1、3~5)。细颈，鼓腹或折腹，一侧出一把或鏊，下有三足。

空足鬯 偶见，如安吉芝里<sup>[27]</sup>G2②:4(图七，2)。细颈，一侧有鏊，下有三足，前两足为空足，鏊下一足作扁实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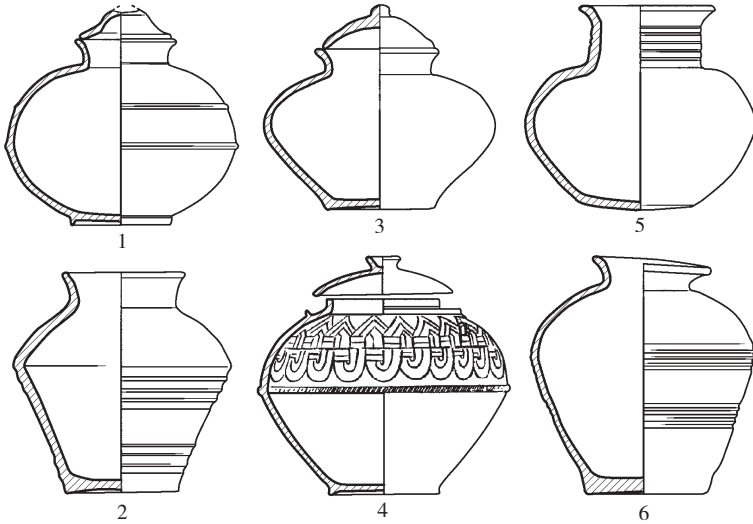
鬯为温酒器，《说文·鬯部》：“鬯，三足釜也，有柄喙”。

第七类，盃类酒器。可能与调酒、注酒有关的陶质酒器有盃。

长流盃 常见，如安吉芝里M83:1(图八，1)。罐形，敛口，长流，有的有把或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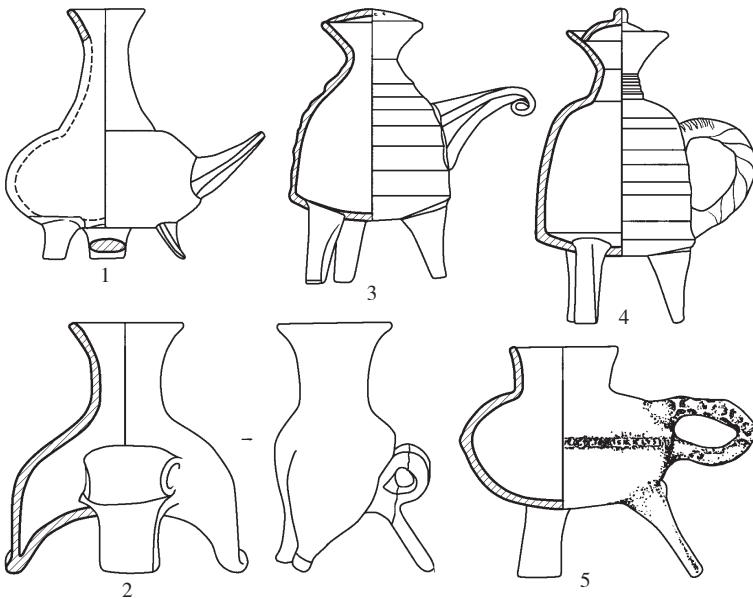
带把盃 偶见，如安吉芝里M46:5(图八，3)。壶形，有把。

三流盃 罕见，如上海崧泽M51:7(图八，5)。三角筒形腹，腹下部向上伸出三



图六 罐瓮类陶质酒器

1、3~5.罐(南河浜M19:6、南河浜M63:6、崧泽M59:2、南河浜M46:18) 2、6.瓮(南河浜M43:5、南河浜M24:6)



图七 鬲类陶质酒器

1、3~5.实足鬲(安乐M96:1, 东山村M91:14、43, 东山村M91:13、44, 新岗M12:8) 2.空足鬲(芝里G2②:4)

朝天流,平底,三矮足。三流盃还见于江淮东部的髡邱龙虬庄<sup>[28]</sup>M40:4(图八,4)。

杯形盃 又称带流杯。偶见,如苏州澄湖<sup>[29]</sup>I H10:5(图八,2)。杯形,敛口,有流,带把。

盃为调酒器,也可用于注酒,《说文·皿

部》:“盃,调味也”。

第八类,壶类酒器。可能与盛酒、陈酒、献酒有关的陶质酒器有壶。

高领壶 常见,形制各异,如吴江同里M16:6、9、10(图九,1、5、3)。折腹或弧腹,平底或矮圈足,有的带盖。腹部往往有精美的纹饰。

细颈壶 常见,形制多样,如吴江同里M19:17、M43:3、M44:22(图九,7、4、8)。折腹或弧腹,平底或矮圈足,有的带盖。腹部往往有精美的纹饰。

长颈壶 常见,如长兴江家山<sup>[30]</sup>M225:4~6(图九,6、2、10)。弧腹或折腹,颈细长,平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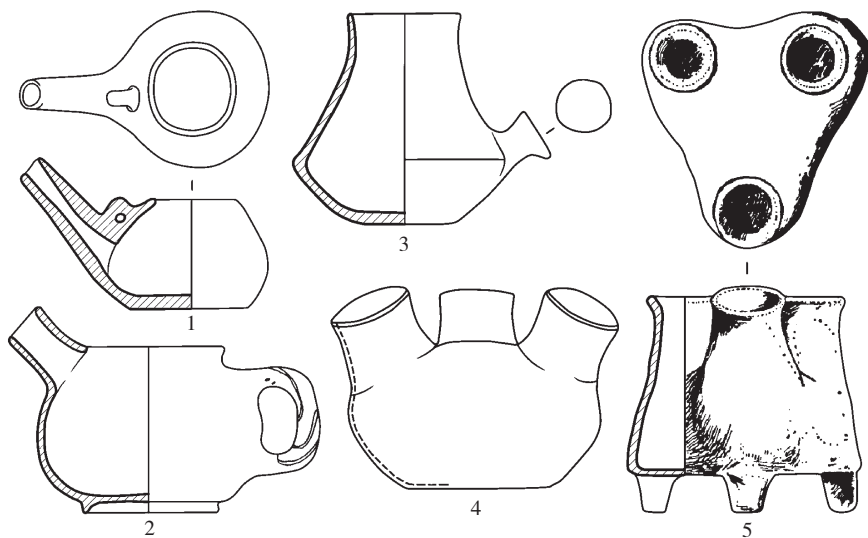
圈足壶 常见,形制多样,如苏州澄湖II H132:1、嘉兴南河浜M23:2、常州新岗M87:2(图九,12、9、11)。弧腹或折腹,平底,圈足或花瓣形圈足,有的带盖。腹部往往有精美的刻划或彩绘纹饰。

壶为古代盛酒器,《周礼·春官·司尊彝》:“其饌献用两壶尊”,郑注:“壶者,以壶为尊”。《公羊》昭公二十五年:“国子

执壶浆”。

陶壶不仅数量众多,形制各异,而且纹饰繁缛,器形端庄典雅,在不同形态、不同用途的酒器中脱颖而出,逐渐“以壶为尊”,成为崧泽文化陶质酒器的代表。

第九类,杯类酒器。可能与献酒、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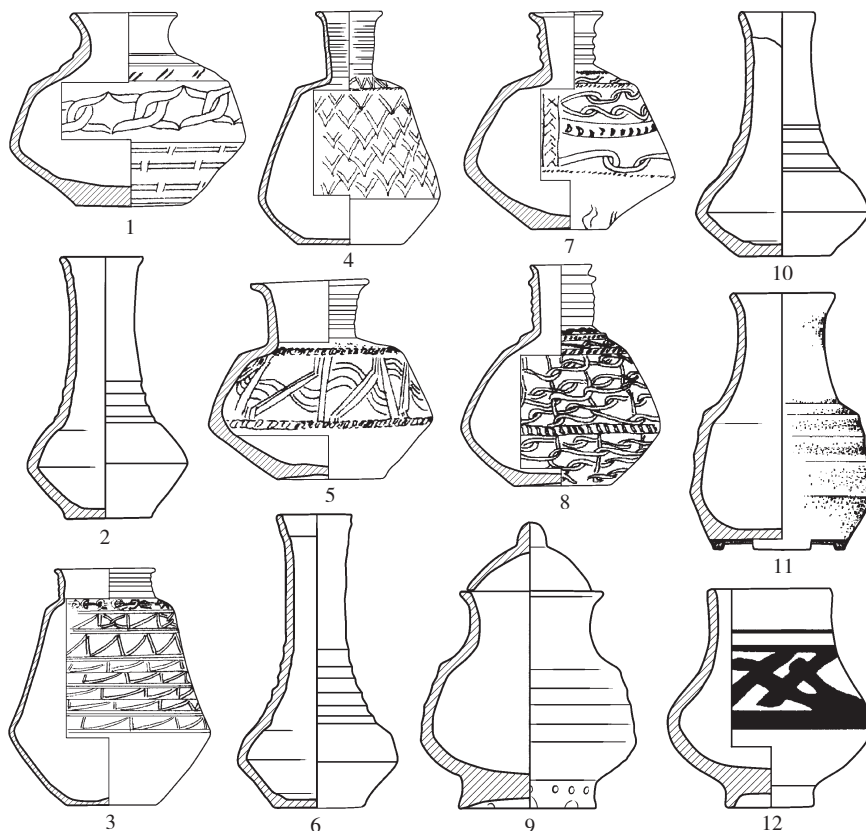


图八 盃类陶质酒器  
1.长流盃(芝里M83:1) 2.杯形盃(澄湖ⅠH10:5) 3.带把盃(芝里M46:5)  
4、5.三流盃(龙虬庄M40:4、崧泽M51:7)

酒、酌酒、饮酒有关的陶质酒器有杯。

尊形杯 偶见，如常州新岗M40:5、M109:10、M109:4(图一〇，1~3)。高杯形，弧腹或腹下部圆鼓，高圈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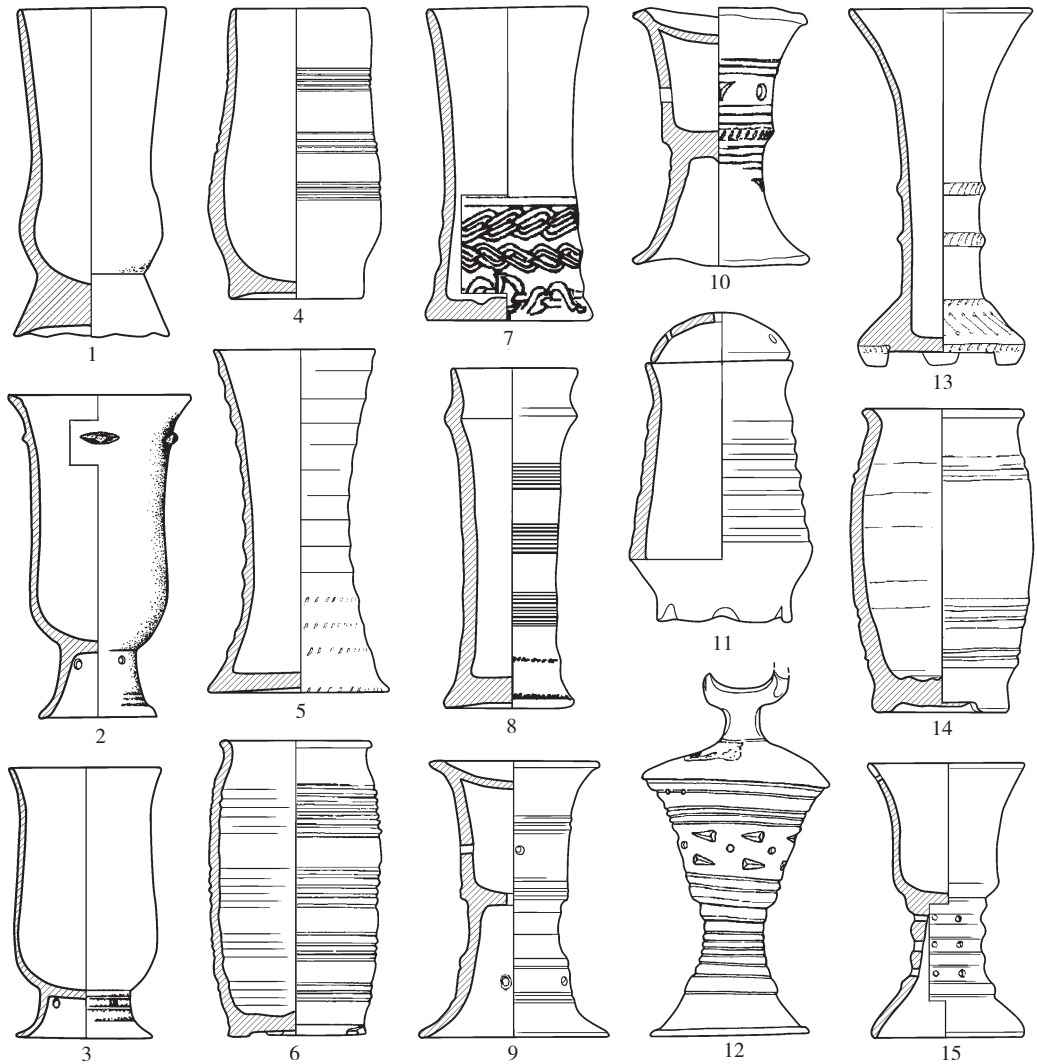
觚形杯 常见，形制各异，例如嘉兴南河浜M59:7、5和吴江同里M61:1、M19:16(图一〇，5、13、7、8)。喇叭形口，形体细高，腹部内弧，平底或矮圈足，也有三足或花瓣形足。器表往往有纹饰。



图九 壶类陶质酒器  
1、3、5.高领壶(同里M16:6、10、9) 2、6、10.长颈壶(江家山M225:5、4、6)  
4、7、8.细颈壶(同里M43:3、同里M19:17、同里M44:22) 9、11、12.圈足壶  
(南河浜M23:2、新岗M87:2、澄湖ⅡH132:1)

觥形杯 常见，形制各异，例如嘉兴南河浜M37:2、M78:12和湖州昆山M47:5、M49:4(图一〇，4、11、6、14)。形体稍粗，腹部外弧，矮圈足或花瓣形足，有的带盖。器表往往饰有纹饰。

高柄杯 常见，如湖州昆山



图一〇 杯类陶质酒器

1~3.尊形杯(新岗M40:5、新岗M109:10、新岗M109:4) 4、6、11、14.觥形杯(南河浜M37:2、昆山M47:5、南河浜M78:12、昆山M49:4) 5、7、8、13.觚形杯(南河浜M59:7、同里M61:1、同里M19:16、南河浜M59:5) 9、10、12、15.高柄杯(昆山M47:1、昆山M51:1、昆山M8:1、南河浜M25:5)

M47:1、M51:1、M8:1和嘉兴南河浜M25:5(图一〇, 9、10、12、15)。上部为杯,下部为高柄,有的带盖。器表往往有精美的刻划纹饰。常见上部为浅碟形的假腹,假腹杯的杯部与柄部有精美的刻划纹饰,镂空多装饰在柄部。

装饰精美、形制多样的杯、尊、觥、觚皆为饮酒器,亦可作为供奉的祭器。《说文·酉部》:“尊,酒器也”,尊用于供奉或祭祀。《说文·角部》:“觥,乡饮酒

角也”,“觚,乡饮酒之爵也”。《大戴礼记·曾子事父母》:“执觥、觚、杯、豆而不醉,和歌而不哀”。

第十类,异形酒器。可能与特殊礼仪或特殊祭祀有关的陶质酒器有异形酒器,主要用于盛酒、注酒或陈酒、献酒。

塔形注酒器 又称塔形壶。常见,如海宁达泽庙M9:1、余杭吴家埠M11:8和嘉兴南河浜M29:8、M25:13、M63:1(图一一, 3、6、1、4、5)。顶端作蒜头形或



为侈口，细长圆柱形颈，腹圆鼓，肩部一侧有一上翘的短粗流，平底或矮圈足。长颈与腹部相通或不相通。器表往往有精美的纹饰。使用时可将酒从短粗流注入，手执长颈，从细长的颈部或短粗流将酒注入饮酒器。

鸟形注酒器 罕见，仅见于嘉兴博物馆收藏鸟形注酒器（图一一，2）。折腹，三足，中腹以上作鸟形，前端为鸟颈，头上昂，张喙；后端有一上翘的短粗流，喙与腹部相通。使用时可将酒从短粗流注入，手执鸟的长颈或腹，从鸟喙中将酒注入饮酒器。

局部造型特殊的盛酒器 偶见或罕见，如嘉兴南河浜遗址出土的鹰首陶壶M15：2、M11：5、M52：4（图一二，1、3、6），

嘉兴大坟遗址<sup>[31]</sup>出土的人首陶壶（图一二，2），嘉兴南河浜遗址出土的兽首陶壶M59：22（图一二，4），长兴江家山遗址出土的鸭形陶壶M225：3（图一二，5）。

整体造型特殊的盛酒器 罕见。如湖州昆山1386/10371，鸟形壶（图一三，1）；常州新岗M39：5，猪形壶（图一三，2）。皆内空，口在背部。类似的猪形盛酒器还发现于高邮龙虬庄遗址<sup>[32]</sup>和新沂花厅遗址<sup>[33]</sup>。

异形酒器可能用于不同目的、不同场合的宴享、供奉或祭祀活动。

### （二）功能

酒器的功能即酒器的用途。根据生产酒的基本流程和酒器的基本用途，可将崧泽文化陶质酒器推测为三类。

第一类，酿酒器。包括甗甑类、盆奩类、大口尊类和滤酒器等器类，可能为酿造过程中的用器。

第二类，贮酒器。主要为罐瓮类酒器，可用于贮存酿造、过滤后的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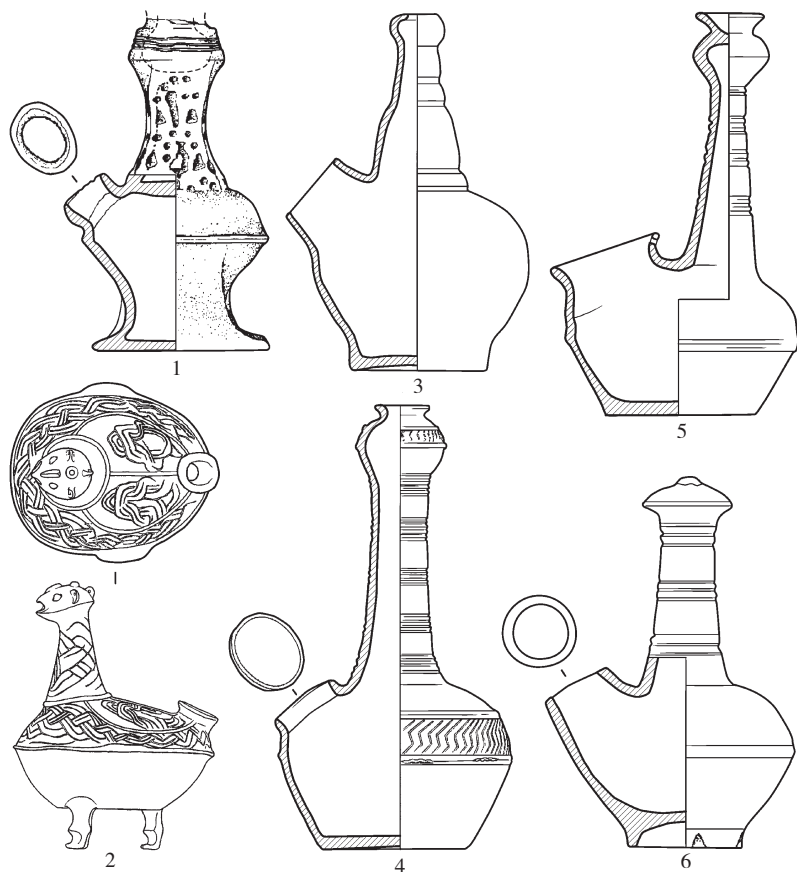
第三类，宴享酒器。包括鬲类、盂类、壶类、杯类、异形酒器，可用于祭祀或宴享活动。

当然，对于崧泽文化陶酒器的具体功能，今后还需要通过对陶器上的残留物进行化学分析等予以验证。

### （三）性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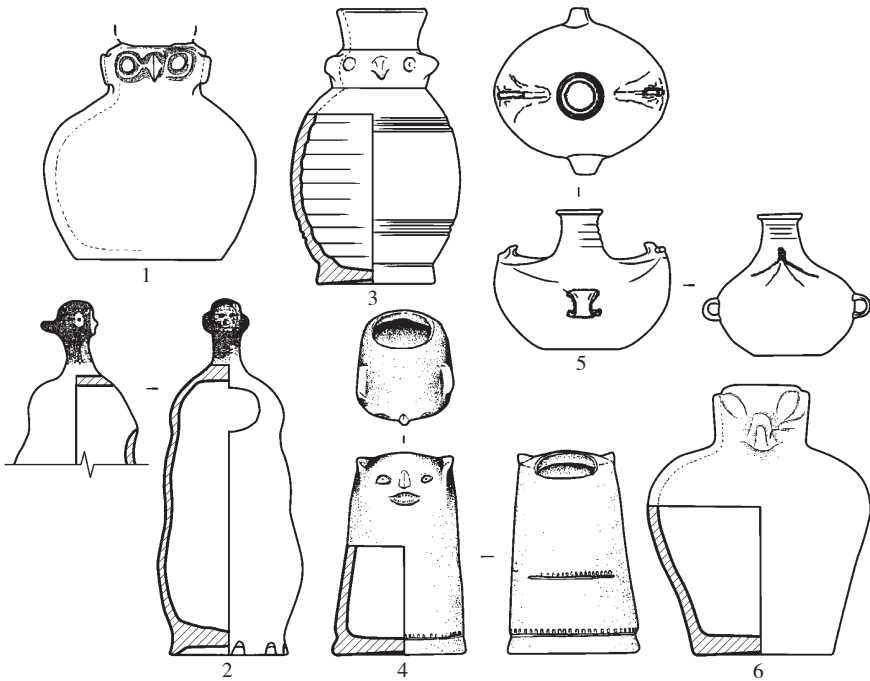
酒器的性质即指酒器的文化属性，可分为两类。

第一类，非礼仪用



图一一 异形陶质酒器

1、3~6.塔形注酒器（南河浜M29：8、达泽庙M9：1、南河浜M25：13、南河浜M63：1、吴家埠M11：8） 2.鸟形注酒器（嘉兴博物馆藏）



图一二 异形陶质酒器

1、3、6.鹰首壶（南河浜M15：2、南河浜M11：5、南河浜M52：4） 2.人首壶（大坟出土） 4.兽首壶（南河浜M59：22） 5.鸭形壶（江家山M225：3）

器。酿酒器、贮酒器或用于酒的酿造、贮存和搬运，属于非礼仪用器。

酿造类、贮存类酒器的功能和用途仅反映了酒的生产、贮藏和搬运过程，与崧泽文化原始宗教的礼制、礼仪似无直接的关联；这类

器，纹饰精美，宴享酒器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不仅反映出崧泽文化礼制、礼仪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崧泽文化社会结构的多元化和分层细化。

酒器形制的一致性，反映了酒在酿造、贮存过程中工序的一致性，它们属于生产、贮存用器而非祭祀、宴享用器，因此不属于崧泽文化礼器的范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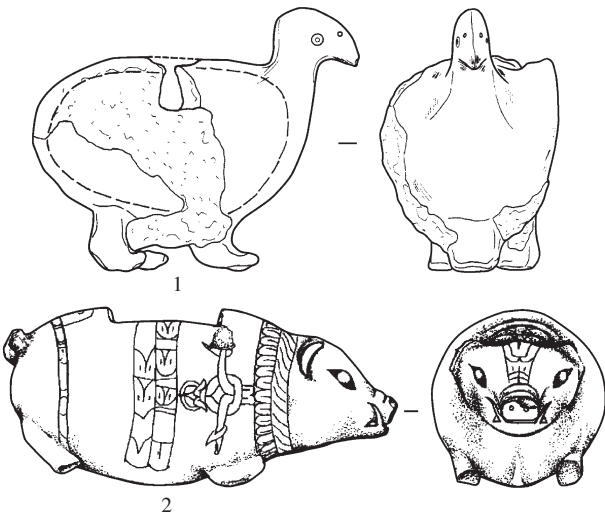
第二类，礼仪用器。宴享酒器用于祭祀或宴享活动时的温酒、调酒、注酒、陈酒、献酒、酌酒和饮酒等行为，属礼仪用器。宴享酒器的造型复杂，形态多

### 三、崧泽文化礼仪制度的蠡测

酒起源于人类进入到农业社会的时期，但陶质酒礼器的出现应与人类社会的复杂化、社会分层的细化和宗教礼仪的制度化相关。

马家浜文化虽然有鼎和豆，但这时尚未出现陶质酒器，更未形成礼器体系。宴享类陶质酒器是崧泽文化时期新出现的礼器，并逐渐形成了完整的礼器体系，长江下游的礼制应滥觞于崧泽文化时期。

崧泽文化最早出现了鼎、豆、壶组合的礼器系统。《诗·唐风·鸛羽》：“王事靡盬，不能蓺稻粱”，鼎即“稻粱用器”；《楚辞·招魂》：“肴羞



图一三 异形陶质酒器

1.鸟形壶（昆山1368/10371） 2.猪形壶（新岗M39：5）

未通，女乐罗些”，豆即“肴羞用器”；《诗·大雅·行苇》：“曾孙维主，酒醴维醑”，壶、杯、觚、鬯、盃等皆为“酒醴用器”。

崧泽文化的鼎、豆、壶代表了祭祀礼仪最重要的三个要素，即稻粱、肴羞和酒醴。

“酒醴之器”是崧泽文化新出现的礼器，因此陶质的“酒醴之器”是崧泽文化最具代表性的礼器。

《诗·周颂·丰年》：“丰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万亿及秬。为酒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礼，降福孔偕”。“为酒为醴，烝畀祖妣”，酒即醴，醴即礼。《礼记·内则》：“宰醴负子，赐之束帛”，郑注：“醴当为礼”。酒与礼有着密切的关系。《诗·小雅·信南山》：“祭以清酒，从以騂牡，享于祖考”；《诗·大雅·旱麓》：“清酒既载，騂牡既备。以享以祀，以介景福”。酒是我国古代礼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诗·鲁颂·有骍》：“鼓咽咽，醉言舞”，《诗·小雅·楚茨》：“孝孙徂位，工祝致告。神具醉止，皇尸载起”。酒与远古时代的祭祀和巫术有着密切的关系，远古时代的人们通过祭祀仪式和音乐舞蹈以乐诸神，娱神祈福。

《诗经》虽不是新石器时代礼制的记录，但《诗经》中保存了大量的上古遗风是显而易见的。

中国古代祭祀的主要对象是天、地和先祖。《礼记·礼运》：“夫礼，必本于天，殽于地，列于鬼神”；《史记·礼书》：“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本也”。在祭天神、祀地祇、享先祖的过程中，酒都是祭祀礼仪中的要素，而酒器则是祭、祀、享的物质载体。

崧泽文化的礼仪制度和礼器体系成为太湖流域文明化进程中的重要环节，并对良渚文化的礼器体系和礼仪制度产生深远的影响。《礼记·乐记》：“天高地下，万物散

殊，而礼制行矣”。崧泽文化的礼仪和礼制虽已不可详考，但崧泽文化祭祀遗迹、高台墓地、大型墓葬和玉器的发现，表明崧泽文化时期已出现事神的巫术活动和复杂的社会等级，肇始于崧泽文化的礼器体系和礼仪制度孕育了良渚文化的礼器体系和礼仪制度，成为良渚文化高度发达的礼仪制度的前奏。

崧泽文化有着发达的稻作农业，有着复杂的社会分层和社会分工，崧泽文化的原始先民既有酿酒的物质基础，又有酿酒的社会需求。酒既是崧泽文化原始先民的物质需求，更是崧泽文化原始先民的精神需求。种类繁多、异彩纷呈的陶质酒器反映了崧泽文化时期稻作农业的发达和制陶工艺的高超，体现了崧泽文化原始先民的审美情趣和文化心理，折射出崧泽文化的社会习俗和社会风尚，暗示着崧泽文化内部存在着复杂的宗教礼仪和繁缛的宗教礼节，标志着公元前3500年前后太湖流域史前社会的进步。

#### 注 释

- [1] 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崧泽——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87年。本文所列该遗址出土陶酒器皆引自此报告，下文不再一一注出。
- [2] 南京博物院：《江苏吴县草鞋山遗址》，见《文物资料丛刊》(3)，文物出版社，1980年。
- [3] 南京博物院：《江苏吴县张陵山遗址发掘简报》，见《文物资料丛刊》(6)，文物出版社，1982年。
- [4] 乌墩考古队：《武进乌墩遗址发掘报告》，见《通古达今之路——宁沪高速公路(江苏段)考古发掘报告文集》，《东南文化》1994年增刊。
- [5] 南京博物院：《赵陵山——1990~1995年度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12年。
- [6]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余杭吴家埠新石器时代遗址》，见《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建所十周年纪念(1980~1990)》，科学出版社，1993年。本文所列该遗址出土陶酒器皆引自此报告，下文不再一一注出。
- [7]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南河浜——崧泽文

- 化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5年。本文所列该遗址出土陶酒器皆引自此报告，下文不再一一注出。
- [ 8 ]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海盐县博物馆：《海盐仙坛庙遗址的早中期遗存》，见《浙北崧泽文化考古报告集（1996~2014）》，文物出版社，2014年。
- [ 9 ]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州市博物馆：《昆山》，文物出版社，2006年。本文所列该遗址出土陶酒器皆引自此报告，下文不再一一注出。
- [10]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海宁市博物馆：《海宁小兜里遗址第一~三期发掘的崧泽文化遗存》，见《浙北崧泽文化考古报告集（1996~2014）》，文物出版社，2014年。本文所列该遗址出土陶酒器皆引自此报告，下文不再一一注出。
- [11]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海宁市博物馆：《海宁达泽庙遗址的发掘》，见《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长征出版社，1997年。本文所列该遗址出土陶酒器皆引自此报告，下文不再一一注出。
- [12] 苏州博物馆等：《江苏吴江同里遗址发掘报告》，见《苏州文物考古新发现——苏州考古发掘报告专辑（2001~2006）》，古吴轩出版社，2007年。本文所列该遗址出土陶酒器皆引自此报告，下文不再一一注出。
- [13] 南京博物院等：《邱承墩——太湖西北部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10年。
- [14] 常州博物馆：《常州新岗——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12年。本文所列该遗址出土陶酒器皆引自此报告，下文不再一一注出。
- [15] 江苏江阴南楼遗址联合考古队：《江苏江阴南楼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文物》2007年第7期。
- [16] 南京博物院等：《江苏张家港市东山村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2010年第8期；《江苏张家港东山村遗址M91发掘报告》，《东南文化》2010年第6期；《张家港东山村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15年第1期。
- [17] 吴汝祚、牟永抗：《良渚文化的礼制》，见《苏秉琦与中国当代考古学》，科学出版社，2001年。
- [18] 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等：《浙江桐乡普安桥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98年第4期。
- [19] a.张明华：《崧泽玉器考略》，见《东亚玉器》（I），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1998年。  
b.刘斌：《崧泽文化与良渚文化玉器的比较研究》，见《海峡两岸古玉学会议论文专辑·二》，台湾大学理学院地质科学系，2001年。  
c.杨晶：《长江下游三角洲地区史前玉璜研究》，《考古与文物》2004年第5期；《中国史前玉器的考古学探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  
d.王宁远、顾晓峻：《崧泽早期玉器的几个特点——从仙坛庙出土玉器谈起》，见《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第六辑，杭州出版社，2004年。  
e.孙维昌：《崧泽文化玉器综论》，见《长江文化论丛》第3辑，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  
f.方向明：《崧泽文化玉器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东南文化》2010年第6期。  
g.田名利、甘恢元：《凌家滩文化与崧泽——良渚文化玉器的初步认识》，见《玉魂国魄——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化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四），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  
h.普安桥中日联合考古队：《桐乡普安桥遗址早期墓葬及崧泽风格玉器》，见《浙北崧泽文化考古报告集（1996~2014）》，文物出版社，2014年。
- [20] 苏秉琦：《关于重建中国史前史的思考》，《考古》1991年第12期。
- [21] a.包启安：《史前文化时期的酿酒（一） 酒的起源》，《酿酒科技》2005年第1期；《仰韶文化遗存与酿酒》，《中国酿造》2007年第1期。  
b.马利清、杨维娟：《从考古发现看中国古酒的起源及其与农业的关系》，《文博》2012年第4期。
- [22] 根据崧泽文化陶质酒器在遗址和墓葬中出现的频率，以出现一次者为罕见，出现二至三次者为偶见，出现三次以上者为常见。
- [23] 麦戈文等：《山东日照市两城镇遗址龙山文化酒遗存的化学分析——兼谈酒在史前时期的文化意义》，《考古》2005年第3期。
- [24]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良渚官井头遗址崧泽文化遗存》，见《浙北崧泽文化考古报告集（1996~2014）》，文物出版社，2014年。本文所列该遗址出土陶酒器皆引自此报告，下文不

- 再一一注出。
- [25]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吉县博物馆：《安吉安乐遗址第一次发掘简报》、《安吉安乐遗址第二次发掘简报》，见《浙江崧泽文化考古报告集（1996~2014）》，文物出版社，2014年。
- [26] 南京博物院等：《江苏张家港东山村遗址M91发掘报告》，《东南文化》2010年第6期。
- [27]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吉县博物馆：《安吉芝里遗址的马家浜、崧泽文化遗存》，见《浙江崧泽文化考古报告集（1996~2014）》，文物出版社，2014年。本文所列该遗址出土陶酒器皆引自此报告，下文不再一一注出。
- [28] 龙虬庄遗址考古队：《龙虬庄——江淮东部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1999年。
- [29] 丁金龙：《苏州澄湖遗址发掘报告》，见《苏州文物考古新发现——苏州考古发掘报告专辑（2001~2006）》，古吴轩出版社，2007年。本文所列该遗址出土陶酒器皆引自此报告，下文不再一一注出。
- [30]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长兴县博物馆：《长兴江家山遗址崧泽文化墓地发掘简报》，见《浙江崧泽文化考古报告集（1996~2014）》，文物出版社，2014年。本文所列该遗址出土陶酒器皆引自此报告，下文不再一一注出。
- [31] 陆耀华：《浙江嘉兴大坟遗址的清理》，《文物》1991年第7期。
- [32] 龙虬庄遗址考古队：《龙虬庄——江淮东部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第289页，科学出版社，1999年。
- [33] 南京博物院：《花厅——新石器时代墓地发掘报告》第132页，文物出版社，2003年。
- （责任编辑 李学来）

○信息与交流

## 《海淀中坞——北京市南水北调配套工程 团城湖调节池工程考古发掘报告》简介

《海淀中坞——北京市南水北调配套工程团城湖调节池工程考古发掘报告》由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编著，科学出版社2017年11月出版发行。本书为16开精装本，正文共344页，约66.2万字，文后附有彩色图版92页，定价328元。

2012年8月至2013年4月，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对海淀中坞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发掘明代墓葬32座、清代墓葬86座和清代窑址7座，以及年代不详的墓葬22座，其中包括

迁葬墓和火葬墓各1座。明代、清代墓葬及清代窑址都曾遭到严重的破坏，保存较差，出土随葬品也比较简陋。墓葬出土器物包括陶器、瓷器、玉器、料器、骨器、玻璃器、金器、银器、铜器、铁器、锡器、石器和铜钱。这些墓葬为研究北京地区考古和中坞古村的历史变迁提供了重要资料。

本书可供从事考古、文物、历史研究的专家学者及高等院校相关师生参考、阅读。

（雨 珩）